

韋伯系列演講— 張旺山「韋伯論學術與政治」 向韋伯致敬

海事所 / 陳力豪

某日心血來潮走進成大圖書館中，看著圖書館書櫃內擺放諸多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著作，非常好奇成大圖書館究竟在辦什麼活動，目光一瞥看到海報上寫著成大校慶活動「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百年紀念與反思」11月8日清華大學張旺山教授，「韋伯論學術與政治」，令我勾起第一次和韋伯邂逅的回憶，韋伯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大學時代修教育學程的時候，在社會學課本讀過他，後來也在行政學課本讀過他，多偉大的一位學者，當下即有一股衝動，11月8日我一定要空出時間來好好認識韋伯，看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學者能夠影響不同領域甚深。

韋伯(Max Weber)生於德國的法學家受過完整的法科訓練，後來轉向經濟學(當時包含在國家學的領域範圍內)與社會學研究。被當代學者公認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領域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與《自殺論》的作者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歷史唯物論」之馬克思(Karl Marx)二者齊名。韋伯最重要的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學術做為一種志業》《政治做為一種志業》等。張旺山，清大哲學系教授，一路來受到正統的哲學訓練，碩士研究狄爾泰，博士研究則是韋伯，其重要著述除了改寫自其碩士論文之《狄爾泰》東大出版外，近年來最有名的著述

即為翻譯《韋伯的方法論》，如果你問張老師為何想翻譯《韋伯的方法論》，老師花費多久的時間，而方法論在研究韋伯有何重要性？張教授總是會淡淡地告訴你，在韋伯當時所在的德國「哲學」並非由拉丁文所寫的，如今我們學習「哲學」一定要學德文。換句話說張教授希望未來的有一天學習「哲學」定要由中文開始，希望中文能夠成為談論哲學中不可或缺的一塊，如果少了中文就宛如哲學少了形上學或倫理學一班同等的道理。張教授談起他翻譯《韋伯的方法論》前後大約花費了十一個寒暑，後來獲得科技部補助，《韋伯的方法論》才得以問世。進一步向張教授請益要讀懂韋伯一定要從方法論開始嗎？或者是由其他方式開始認識韋伯，但最後要回歸方法論才能夠融通？張教授說韋伯曾經有個比喻，他本人覺得蠻好的，「方法論」好比醫師與藥方，一個人一定有病才會去看醫師請醫師開藥方，如果你早就認識韋伯何必執著方法論，或者是由何門入來認識韋伯呢？方法論應是對研究的反省與反思。若你曾經看過張教授，或跟他聊過，你一定會跟我有一樣的感覺，一個不像哲學家的哲學家，但有哲學家(或學者)的風骨。希望未來的人們若要學習「哲學」這個範疇，必須從中文入，或者說中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我將此文定名為「向韋伯致敬」，副標「向張旺山老師致敬」。

11月8日清華大學張旺山教授，主講的「韋伯論學術與政治」，係韋伯演講百年紀念與反思活動的首場，由張教授來開場我覺得再合適不過，臺灣應該沒有人比張教授更瞭解韋伯，認識韋伯。開場時由成大圖書館館長王健文教授介紹張教授，王館長與我有同感的認為首場由張教授來擔綱是再合適不過了。張旺山教授說這場的講題之所以定名為「韋伯論學術與政治」，源於韋伯的兩篇文章《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是由韋伯於1917年在慕尼黑大學對學生進行的演講文，韋伯從自身經驗出發，比較德國與美國大學體系之異同，談論體系如何影響年輕人選擇學術研究作為職業。以此為出發點，韋伯討論從事學術所必須具備的內在特質，指出學者因學術特性而必須面對的孤獨、超越道路，這讓目前在成大唸博士班，未來想往學術領域發展的我有相當大的體悟與感觸；而後韋伯又於1919年在慕尼黑大學進行的演講，此次的講題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談論作為政治家應具有的理想素質為何？回顧當時的德國政治氛圍正值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左派與右派互相鬥爭，國內政治紛擾的年代，韋伯希

望藉此激發政治家的風骨與風範。韋伯在文中點出「許多從事社會運動者的弊病：徒具心志倫理，欠缺責任倫理」；而就政治家而言三種使命「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是需要的。因此引述韋伯的話「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對這種東西缺乏興趣，更毫無使我感動之處。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以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騖；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身處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完整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使命的人。《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此兩篇文章因此交織而成張旺山教授的這一場講題。然因在場與會人士並非所有都是熟悉韋伯理論者或者對韋伯有一定的認識，故張教授並未深入談論《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篇文章，而是由韋伯的生平來談論韋伯與其在學術上的地位與成就。首先張教授談論到韋伯是一位早熟、天

才型與全方位的學者，13歲時韋伯撰寫了兩篇歷史論文送給父母，分別為《論德國歷史的發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及《論羅馬帝國從君士坦丁至民族遷徙運動的歷史》；14歲時對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政治判斷」做出批判，由此可見韋伯是一個早熟與天才型的學者。前面說過韋伯接受過完整的法科訓練，後來轉向經濟學與社會學研究。韋伯先後任教於於弗萊堡大學、海德堡大學、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知名大學，在大學任教的過程中韋伯因家庭因素所致，受心身症所苦，使他不堪負荷大學的工作量，在1899年的學期中途休假離開，並在1902年時重返教職，最後於1903年脫離大學的束縛。張教授稱韋伯是一個好的學者，但並非好的教者。韋伯於1904年時提出資本主義的普世性與普效性，認為資本主義是決定人類生活的主要力量。其中韋伯也認為唯有西方的社會才得以創造出資本主義這樣的產物，這一系列的論點發表於其擔任副主編之《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期刊，此一系列的文章集結為後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文，成為後來他畢生最著名的著作。會中張教授也談論到韋伯與妻子及情婦之間的關

係與軼聞，並說到韋伯著作許多都是在他死後才被收集、修訂、並出版，這些工作主要是由妻子進行負責。

在張教授的演講後，許多與會的學者和學生非常熱絡地與張教授對話，意猶未盡，可惜時間僅停留於11月8日晚上的9時15分。對我而言對韋伯這位學者有更全面的認識，並非僅停留在大學社會學課本中詮釋社會學的學者，或者行政學課本中理想型組織的提出者、鐵籠的提出者罷了。「由一系列的書認識一個時代，或由一系列的著作認識一位學者」，這是我未曾有過的經驗，也未曾在任何圖書館參加過類似的展覽或活動。期望成大圖書館未來亦能夠多舉辦類似的活動，讓我們從中認識偉大的學者或其他時代偉大的學術論述與產物。